

论《人物志》“才性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贾奋然

提 要 作为魏代有着重要意义的才性论专著《人物志》对后来的《文心雕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着力分析刘勰对刘劭“才性论”的借鉴、发展、转化的情况。从刘劭识鉴人才的“才性”、“偏材”、“八观”到刘勰品鉴文学的“体性”、“偏美”、“六观”,可以明显见出两者之间的渊源和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才性 体性 偏材 偏美 八观 六观

《人物志》是魏代刘劭的一部讨论如何鉴察人物和选拔人才的著作,也是魏晋时期流传下来的较为系统探讨才性问题的专论。《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史上最全面、最系统的文学理论专著,它多方面地总结了前人关于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的经验,同时最广泛地吸取了前人的文学和美学思想。比较二书,我们发现,刘勰《文心雕龙》议论才性,甄别风格,品鉴作品,无论从范畴、观念到方法,都可以明显看出《人物志》的影响。虽然我们目前尚无文献考证刘勰确实研读过刘劭的《人物志》,但是可以确考的是刘勰接触过刘劭的作品。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两次评论过刘劭的《赵都赋》。《事类》篇曰:“刘劭《赵都赋》云:‘公子之客,叱劲楚令歆盟;管库隶臣,呵强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称理得而义要矣。”^①《才略》篇曰:“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刘勰认为《赵都赋》用典相当精要确切,刘劭的写作才能可以和前代赋作的名家媲美。既然刘勰极为欣赏刘劭的赋作,那么,也可推论刘勰对于在魏晋以来影响极大的刘劭的《人物志》应该有所了解。以刘勰在定林寺博览群书、研读经史典籍长达十年之久的经历,和他在撰写《文心雕龙》的包举洪纤、弥纶群言的气势和胸襟,他在写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完全可能受到刘劭的《人物志》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然,关于两书之间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我们还必须通过具体行文所体现的范畴、观念和思想的比较来得到更为确切的明证。刘劭《人物志》之“才性论”的独特意义及其对于魏晋南朝审美思潮的影响,学者已多有论述。^②但关于《文心雕龙》与《人物志》的直接关联性少有涉及。本文着力于就刘劭《人物志》中的“才性论”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及刘勰对刘劭“才性论”的继承、发展、转化来探讨一种思想资源在一种文学观念形成中的重要意义。

^① 本文引用《文心雕龙》文字均出自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后文恕不再一一注释。

^② 如王晓毅:《魏晋才性论新探》,《东岳论丛》,1986年第3期;李建中:《才性刍议》,《四川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等。

一 才性与体性

关于才性的讨论较早出于政治上考鉴人才的需要，东汉实行“察举”、“征辟”制度取士，需要通过品鉴人物来选拔人才，因此汉代人物品评风气尤为盛行。对人物的品鉴开始侧重于人物的政治才能和道德品性之间的关系，如汉代乡闾举孝廉、贤良方正之类。这与先秦时期儒家在谈论人性问题时多指伦理道德之性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如孟子论“性善”，荀子论“性恶”，管子论“性有善有恶”等。才性理论发展到汉魏之际开始出现了新的风气，即衡量人才的标准从重视人物道德性情修养逐渐转变为看重人物的个性气质。这种新的风气首先从曹操“唯才是举”的政治选举标准中表现出来，其《求贤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此意，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①曹操明确提出重才不重德的选举标准。徐干《中论·智行》顺应潮流也专门讨论了人才的才智与笃行的关系，其论曰：“或问曰：‘士或明哲穷理，或志行纯笃，二者不可兼，圣人将何取？’”对曰：“明其哲乎。”^②徐干倾向于重才智而轻笃行，显示了当时新的时代风尚。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③曹氏集团的求贤举措不仅仅是政治策略，实际上已经是汉魏才性思想重大变革的先声。刘劭顺时而动，其《人物志》从理论层面完成了魏晋才性理论由重德性向重个性的转化，在魏晋思想史中具有重要地位。

刘劭在《人物志》中首先对才性之“性”作了新的界定。《人物志·九征》曰：“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④人物才性以“元一”为根柢，以“阴阳”为体别，以“五行”为形异，主要本于人物与生俱来的自然禀性，而不是通过后天修养而生成的道德品性。虽然圣人是“兼德”的德才兼备者，但绝大多数的“偏材”^⑤不能完美地清和阴阳二气和兼备“五行”之质，他们的才性有所偏，却有着各自擅长的治国专长，刘劭对这些不具有“中庸之质”的“偏至之材”予以了高度的肯定。《人物志》用了大量的篇幅细致而周详地辨析了“偏材”，详尽地阐明了由于秉气“偏兼多寡”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性格气质类型和人才类型，并阐明了他们的不同特征和长短得失。如刘劭在《体别》篇中将人才根据个性特征分为十二种类型：强毅之人、柔顺之人、雄悍之人、惧慎之人、凌楷之人、辨博之人、弘普之人、狷介之人、休动之人、沉静之人、朴露之人、韬讷之人。《材理》篇辨析了九种性格偏颇的人：刚略之人、抗厉之人、坚近之人、辩给的人、浮沉之人、浅解之人、宽恕之人、温柔之人、好奇之人。《流业》篇讨论了十二类臣才及其特长，其论曰：“盖人流之业十有二焉。有清节家、有法家、有术家、有国体、有器能、有臧否、有伎俩、有智意、有

① [晋]陈寿著、[刘宋]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

② [魏]徐干：《中论》，《汉魏丛书》本。

③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④ [魏]刘劭：《人物志》，《汉魏丛书》本。本文关于《人物志》的文字皆出于此本，恕后文不再一一注释。

⑤ 刘劭：《人物志》中的“偏材”，可通“偏才”。

文章、有儒学、有口辨、有雄杰。”这些具体而微的对于才性类型的辨析都在个性层面上肯定了人才的价值,从而使得由曹操等人开创的重个性才能的理论落实到了更为系统的理论化和实证化的层面,标志着才性理论在魏代的转型。

魏代关于才性问题的讨论也在魏晋玄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魏晋名士玄谈的重要论题之一就是才性同异的名辩。据《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注引《魏志》:“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①可见,傅嘏与钟会等人曾讨论才性同异或离合问题,钟会集撰《四本论》,可惜亡佚,无从知晓具体内容。但名士们关于才性之间的同异离合问题的玄谈无疑在理论层面推进了才性论的发展。事实上,从汉代清议对人物才性的评议到魏晋玄谈品鉴士人才性,可以明显见出从道德实用向审美品鉴过渡的痕迹。刘宋时期刘义庆及其门徒编撰的《世说新语》大量记录了有关魏晋审美品藻的具体事例。如《赏誉》云:“世目李元礼‘谡谡如劲松下风’”;“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容止》云:“山公曰:‘嵇夜叔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容止》)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魏晋审美品评的主要内容是对人物的容貌、才情、气质、风度等方面进行品鉴,这使得人物的风神气韵和个性特征得到生动的显现。

从刘劭论“才性”到刘勰论“体性”,标志着汉魏以来的才性论从哲学、政治学、玄学、美学层面开始向文学审美论转化。随着文章重要性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文人的地位的逐渐提高,关于作家的创作才性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实际上,刘劭《人物志》对“人流之业”的十二种人才类型的区分中已经论述到了与文章写作有关的才能,诸如“文章”、“儒学”、“口辨”。刘劭曰:“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这已经精要地概括了文章写作才能的特点。但刘劭毕竟是将重点放在议论各类治国人才的特点,而所谓“文章”之才只是治国才能一类,因而没能对之进行细致的区分和辨析,但刘劭对于“偏材”的讨论已经极大地启发了后人关于文章写作中的创作才性论的关注。在刘勰系统讨论文章写作中的“体性”问题之前,曹丕已经提出了“文气说”,首次将文章写作与作家个性紧密联系起来。《典论·论文》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②曹丕在此所谓“气”是指“体气”而言,即作家独特的先天禀赋,这是自然赋予的独特才能,不能力强而致,也非后天习染所成,故虽父子兄弟不能相传。这与刘劭关于才性论的界定一致,淡化了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德行,凸显了属于个体独一无二的先天才性与文章写作的关系,可说是一种创作主体个性解放或主体觉醒的先声。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则更为完备和系统地提出“体性说”,其论曰:“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譟,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刘勰指出情理隐内,言文显外,主客相应,表里必符,作家的

①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6页。本文关于《世说新语》的文字皆出于此本,后文不再一一注释。

② [魏]曹丕:《典论·论文》,见《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52。

才能、气质、学问、习尚与其文体形态有着内在的对应关系,作品的文辞、风貌、用事、体式等都会打下了作家个性化烙印。刘勰的“体性”说全面地界定了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曹丕一致,刘勰承认先天禀赋与气质对才性形成的重要意义,刘勰又进一步强调后天习染对于才性的形成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再度将先天之才气和后天之习染统一于作家创作个性之中,实现了更高意义上的才性理论的综合。从“才性”论到“体性”论,刘勰将刘劭关于政治才性的讨论完全转换到对于文学才性的讨论,如刘劭讨论士人的个性与政治才能之间的关系,刘勰则讨论文人的个性、写作才能及其写作风格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见出两人对于才性问题的探讨具有“异质同构”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体性》曰:“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刘劭《人物志·九征》曰:“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比较二论,我们不难看出刘勰之论“情性”多半受到刘劭《人物志》文字的影响,人物本于“情性”,“情性”却与一个人的先天“血气”有着重要关系,但刘勰对于刘劭的“血气”论又有所发展,他认为单纯的“血气”尚不足以构筑人的“情性”,先天血气和后天情志的结合才能形成作家独具特征的“情性”,这种情性恰恰是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的根源。作家独特的创作才能和创作风格都来源于他们独特的情性,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沈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锐,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体性》)刘勰在这段文字中列举了汉、魏、晋时代的十二位著名作家,讨论他们的才性特点,诸如俊发、傲诞、沈寂、简易、雅懿、淹通、躁锐、气褊、俶傥、俊侠、轻敏、矜重都是不同的作家的情性之别,因此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创作才能和写作风格。

二 “偏材”与“偏美”

刘劭《人物志》将人才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三大类。《九征》曰:“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才,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兼德”是具有“中庸”之质的圣人,有着“阴阳清和”、“中睿外明”的特点,是人主之才;“兼材”,以德为目,德才兼备,大体具有“中庸”之质,有着若干种才能;“偏材”是具有某方面专长的人,故以才为名,其德与“中庸”无涉,是人臣之才。刘劭坚持德、才兼备的人才评价标准,但对于“德”的界定却是以“中庸”为最高标准,即“五常既备”、“五质内充”、“五精外章”,能够调和阴阳,将金、木、水、火、土五种质素兼备于一体,才能达到完善之性。“偏材”秉“阴阳”之气而有所偏,体“五行”之质而有所长,虽不具完善的美德,却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才能。尽管“偏材”不是最完善的才性,但刘劭对之高度重视,用了大量篇幅细致辨别了各种不同的偏才类型及其长短得失,并讨论了识鉴偏才的方法。“偏材”之性各自有所长短,所谓“善有所章”、“理有所失”,如“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每在宽容,失在少决。雄悍杰健,任在胆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体别》)偏才之性情有所偏,才能也就各有所偏,《材能》曰:“夫能出于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异。……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

官，而短于为一国。”刘劭考辨“偏材”之性，其目的在于找到“偏材”之能，如“强毅之人”的个性是“狠刚不和”，才能特点是“可以立法，难与入微”；“柔顺之人”的个性是“缓心宽断”，特点是“可与循常，难与权疑”；“雄悍之人”的个性是“气奋勇决”，特点是“可与涉难，难与居约”……（《体别》）通过对于“偏材”的才性的考察，可以使得各类人才人适其职，取得其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刘劭对于人才类型的分类和对于“偏材”的考辨都极大地启发了文学创作中的文人才性的“兼”与“偏”的思考。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单独列出《才略》篇，专门品论历代作家的才性、才能，极有可能是受到了刘劭《人物志》议论人才的直接影响。《人物志》极为看重“偏材”的意义，刘勰也强调“才性异区”，肯定了“性各异禀”对于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刘勰在《才略》中对从先秦、两汉到魏晋的重要作家的才性进行了品评，如贾谊“才颖，陵轶飞兔”；司马相如“洞入夸艳”、“理不胜数”；扬雄“涯度幽远，搜选诡丽”；桓谭“长于讽论，不及丽文”；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曹丕“洋洋清绮”、“虑详而力缓”；曹植“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左思“奇才，业深覃思”等。文人性情各有所偏，“迭用短长”，则能出奇制胜，各自驰骋于文坛。刘劭在《人物志》中谈到才性的兼、偏，这对刘勰也有很大的影响。《明诗》曰：“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通圆。”在这段文字中，刘勰对诗歌的不同类型与诗才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四言诗、五言诗由于在产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体制特点和规范要求，不同诗人才性各异，往往只擅长诗歌某一种类型，如张衡、嵇康擅长四言诗，张华、张协、左思、刘桢五言诗写得较好；同样由于才性差异，不同的诗人写出来的诗有着不同的特点，如张衡四言诗具有雅正的特点，嵇康四言诗则以润泽见长，张华五言诗清新，张协五言诗华丽。刘勰认为，在诗歌的不同体裁类型写作中，通圆者少，偏美者众，这是普遍现象，像曹植、王粲这样能兼善四言诗和五言诗的才华横溢的诗人是十分少见的。刘勰《才略》也曾称赞王粲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王粲虽然诗、赋兼善，但是于诗、赋以外的其他文章类型的写作就不那么擅长了，如曹丕所言：“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①“体弱”，“不足起其文”，这些恰恰是王粲才性有所偏的表现。

刘劭在《人物志》中讨论了才性与官职之间适应性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才能，不同的职位也有着不同的才性需要，因此，刘劭强调“量能授官”，统治者用人时应该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使职得其人，才尽其用。这种人才理论启发了刘勰关于作家才性与文类之间的适应性的关系的思考。由于不同的文学体裁有着不同的思维特点和才性要求，诸如诗、文不同，文、笔有别，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兼善众体，不同的文人往往只能在某些体裁形式中使得自己的才性得到极至的发挥，文人偏美于某种体裁类型也是常见的现象。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大量列举了众多偏美之才及其所擅长的文类形式：“刘向之奏议，旨切而调缓；赵壹之辞赋，意繁而体疏；孔融气盛于为笔，祢衡思锐于为文，有偏美焉。潘勖凭经以骋才，故绝群于锡命；王朗发愤以托志，亦致美于序

^① [魏]曹丕：《与吴质书》，北京：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文选》卷42。

铭。……琳瑯以符檄擅声；徐干以赋论标美，……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有足算焉。……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成公子安选赋而时美，夏侯孝若具体而皆微，曹摅清靡于长篇，季鹰辨切于短韵，各其善也。……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孙盛、干宝，文胜为史”《文心雕龙·书记》曰：“后汉书记，则崔瑗尤善。魏之元瑜，号称翩翩……至如陈遵占辞，百封各意；弥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刘勰盛赞偏才各有偏美，他们各自擅长写作不同的文章类型，并且使得才性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这有力地促进了各类文体的发展。刘勰因此提倡文人“惟才所安”“随性适分”（《明诗》），“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体性》），即根据自己的才性特点来锻炼自己的写作才能，选择适合于自己写作的方向，从而谋求才性与文类的吻合，此即刘勰所言“文之司南”。如果不懂得“度材准性”，违背自己的才性强行追新逐奇，则不免闹出“削足适履”的笑话。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批评孔璋则为一例。其论曰：“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①孔璋的才能主要在写作章、表方面而非辞、赋方面，但孔璋却不自量力，欲跻身于辞、赋之列，乃至要与司马相如媲美，这种悖才妄为之举，不免遭人讥笑。

从刘劭论“偏材”到刘勰论“偏美”，可以明显见出两者的渊源演化关系，刘劭指出“偏材”各有长短，不如“兼德”完美，但却有着某方面的专才，应该得到重视。而对文学创作来说，偏才之性恰恰是创作个性和创作才能的表现，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个性的人能够写出有杰出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品。刘勰以“偏美”界说偏才，可见，他已经充分估量了文人独特的才性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三 “八观”与“六观”

刘劭《人物志》不仅辨别了人物才性的类型，而且提出了识鉴才性的方法。他在《接识》、《八观》、《七缪》、《效难》等篇中分别提出了“八观”、“五视”等识人的方法，并讨论了在识鉴人才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七种偏差，即“七缪”。刘勰《知音》则阐释了如何对文学作品进行鉴赏和批评，提出了文学鉴赏和批评的“六观”法，同样也讨论了文学鉴赏中出现的误区和由此带来的问题。对人物才性的品鉴和对作家作品的鉴赏，这两者之间的确具有诸多类似之处，细读二书，我们也可明显见出《文心雕龙》对于《人物志》的借鉴和发展。

刘劭《人物志》中谈论到识鉴人才之难，《效难》曰：“盖知人之效有二难：有难知之难，有知之而无由得效之难。”识鉴人才之难，首先在于人才本身的复杂性，“人物精微，能神而明”，使人难以了解；其次，识鉴者本人的主观性也会影响到考察的准确性。刘勰《知音》开篇就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刘勰感叹的是文学鉴赏中的“知音难逢”，这同样是由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是“音实难知”、“文情难鉴”，文学作品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次是真正懂得欣赏作品的“知音”不易找到，“知实难逢”。如何能成为识鉴人才的“伯乐”，如何能成为品鉴作品的“知音”，这确实不是容易的事情。刘劭《人物志》谈到人物识鉴者应该避免的七种错误，《七缪》曰：“一曰，察誉有偏颇之缪；二曰，接物

^① [魏]曹植：《与杨德祖书》，《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42。

有爱恶之感；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识鉴者本人的判断能力、感情好恶、认识差异、性格类型都可能影响到人物考察的准确性和公允性。刘劭识鉴人才的“七缪”和刘勰论文学欣赏的误区多有相似之处。如刘劭认为“察誉有偏颇之缪”，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信耳而不敢信目”，即“人以为是，则心随而明之；人以为非，则意转而化之”；刘勰也谈到文学欣赏“贵古贱今”、“信伪迷真”（《知音》）的情况，究其根源恰与“信耳而不敢信目”一致。刘劭曰：“接物有爱恶之感”，具体表现是“亲爱同体而誉之，憎恶对反而毁之”，其心理根基是要“证彼非而著己是也”；刘勰指出，文学欣赏中也经常会出现偏颇的情况，譬如“崇己抑人”、“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正是由于欣赏者“私于轻重”、“偏于爱憎”而导致不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知音》）。刘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对才能的识鉴会因人物的地位，贫富等外部原因所蒙蔽，而不能客观地评价人物；刘勰也谈到世人对曹丕和曹植的评价受到二人的地位、处境的影响而不够公允，《才略》曰：“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无论是人才识鉴者还是作品鉴赏者都应该尽量排除主观偏见，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人才和作品。

为了全面地识鉴人才，刘劭提出了识鉴人才的“八观”法，“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怨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八观》）“八观”是从情性、情绪、禀性、心态、动机、行为、个性、智力等诸多方面对被品者才性的全方位考察。值得关注的是，刘勰也提出了文学鉴赏和批评的“六观法”，《知音》曰：“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六观”法是从作品的体裁、辞藻、用典、声律、风格及对于前代的因革等方面进行全面观照，以区分艺术作品的优劣得失。从刘劭的“八观”到刘勰“六观”，都遵循着从不同层面圆照对象的方法，既评价对象的局部特性，也评价其整体特性。虽然我们仍然不能确考刘勰的“六观”直接借鉴于刘劭的“八观”，但两者之间具有的关联性是显而易见的。

“才性论”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从刘劭识鉴人才的“才性”、“偏材”、“八观”到刘勰品鉴文学的“体性”、“偏美”、“六观”，我们可以明显见出两者之间的借鉴和发展的关系。刘勰将刘劭品鉴人才的“才性论”的思想资源成功地转化成为文学理论的范畴、观念和方法，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文学理论家的卓识、气魄和才能。今天，我们对于两者之间的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的研究，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于《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理解。

（作者通讯地址：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89）

（责任编辑 晓宁）